

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研究

陈绪敖

(安康学院 陕南生态经济研究中心 陕西 安康 725000)

提 要: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在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秦巴山区属于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双重任务。从生态脆弱与“空间贫困”陷阱演进的成因分析秦巴山区贫困特征,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恶性循环,指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具有一致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特征;二者互动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域文化等内部因素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市场需求拉动等外部因素;通过二者互动发展达到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减贫效应多重目标的实现。

关 键 词: 秦巴山区;生态保护;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6)06-0184-07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6.06.033

秦巴山区地跨陕、甘、川、渝、鄂、豫五省一市,既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140004.5平方公里,承载着南水北调中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修复任务;又是新时期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有75个特困县,占全国680个特困县的11.03%,其中特困人口达302.5万人,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科学原理对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进行耦合性分析,破解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恶性循环,探寻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良性循环运行的内在演进机理,进而从认识论上实现发展观由“穷山恶水”向“金山银山”的转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秦巴山区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战略指明了方向,即绿色减贫的发展路径选择。产业精准扶贫是从区域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入手,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修复作为反贫困的一种策略,以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形成的绿色生态资源资产化作为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扶持培育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特色产业聚集、产业融合,达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控制资源消耗、再生和污染物排放,巩固生态保护成果与提高扶贫效率的多重目标。

一、秦巴山区生态脆弱与“空间贫困”陷阱演进的成因

秦巴山区是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殊区域。它是

我国南北水系和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水岭,气候温和、雨量充裕,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储量十分可观;又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汇处,是人类开发较早的区域之一。然而,该地区属于典型的空间贫困,具有集中连片特困与生态环境脆弱耦合的双重特征。长期贫困并难以脱贫是由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形成的空间贫困陷阱(SPT)^[1],进而演化成区域空间的“环境脆弱→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退化→低水平发展”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恶性循环。剖析空间贫困陷阱及恶性循环的原因及演进机制成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逻辑起点。

(一) 空间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从空间自然生态系统分析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的成因,相关学者分别从山区地形、人口增长、交通的可通达性、气候条件、自然灾害等多维因素进行了梳理,如周亮等^[2]通过对秦巴山区各县区地形起伏与人口及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指出,地形起伏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秦巴山区各县区地形起伏、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减的梯度空间规律,从而形成空间地形起伏与所在县人口密度、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即区域地形起伏越大,人口密度越小,经济发展受限制越强,相反地形越平缓,经济活动则越活跃,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集聚;梁增泰^[3]、赖作莲^[4]、鲁西奇^[5]、孟文科^[6]等研究指出,在明清以前秦巴山区人口相对稀少,明朝中叶时每平方公里只有0.23人,到20世纪末秦巴山区人口达到523.49万人,每平方公里达到23人以上,在交通阻塞的相对封闭系统内人口增长形成

对山地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导致山区有限的可耕地资源很快就被消耗殆尽,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王璐^[7]等研究指出,秦巴山区交通可达性呈现以由县城驻地或地级市驻地向外围衰减的空间特征,从而形成市场参与不够,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难以有效地发挥农副产品消费地和工业生产集聚中心职能,对其腹地的辐射带动与人口吸纳效应弱;秦巴山区也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赵世发等^[8]通过统计1954~2001年陕西省地质部门地质灾害普查资料和2002~2006年陕南实际发生的地质灾害资料,发现滑坡(含崩塌)、泥石流是秦巴山区主要地质灾害,期间共发生滑坡3798次、泥石流314次,频发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程度。

归纳相关研究成果,秦巴山区耕地资源有限且质量低下、交通可达性差、市场进入性差、自然灾害频发等自然生态条件脆弱,在人口相对稀少情况下,相对丰裕的自然生态资源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然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在生产水平低下且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们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等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破坏,自然灾害进一步频繁,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贫困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二) 空间经济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工业化程度是衡量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率、投资效率等综合指标反映了该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如表1所示)。与全国及发达省市相比较,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导致需求水平低,投资效率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偏高,第二产业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和完整的体系,城镇化率低等使得区域缺乏核心增长极,缺乏具有专业化、规模化的产业基地、龙头企业,进而对整个第三产业的带动力弱。

受贫瘠的耕地资源、交通阻塞、人口散居、人力资源素质低下、市场发育不充分等客观因素影响,制约了生产要素及资本流动的区位寻优规律,难以在区域内完成专业化分工、要素聚集、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动力,从而长期处于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9]。秦巴山区由于其“要素失衡缺失陷阱”^[10]的存在,使得经济发展中出现自然资源外流、产业结构失衡、资金外流、人才流失、技术缺失、信息滞后等空间经济系统恶性循环,形成了区域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水平低下的低端化发展路径锁定。

(三) 空间人文社会系统恶性循环陷阱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受到资金、土地以及环境容量等各种硬约束,更要受到人才、技术、文化、制度等软约束。”^[11]以政府公信力、区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源素质等非物质要素构成的空间人文系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它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感召力、创造力和整合力,决定着区域发展的质量,成为区域跨越式发展的无形力量。秦巴山区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文化,逐步演化成了人力资源

素质低下、思想观念保守、公共服务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及社会学习网络缺失等“软实力”资源的匮乏,最终形成区域自身发展能力的缺陷。

表1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国民经济

发展水平主要指标(2010年)

区域	GDP 增长率 (%)	产业结构 (三次产业占 总产值比重)	城市 化率 (%)	固定资 产投资 增长率 (%)	城镇居 民人均 可支配 收入 (元)	农村居 民人均 纯收入 (元)	贫困 人口 (万人)
全国	10.3	10.2:46.8:43.0	49.7	23.8	19109	5919	2688
汉中市 (陕西)	15.1	21.7:39.1:39.2	40.5	31.2	14509	4183	108.7
安康市 (陕西)	15.0	20.5:39.6:39.9	34.0	32.0	14642	3976	100.5
商洛市 (陕西)	14.9	20.3:41.2:38.5	35.2	31.6	14811	3605	95.8
陇南市 (甘肃)	11.8	26.3:28.6:45.1	19.7	22.5	10623	2299	130.5
广元市 (四川)	15.9	23.8:39.0:37.2	34.5	9.3	12509	4036	63.2
巴中市 (四川)	14.7	29.1:33.8:37.1	29.3	35.7	9694	3847	87.1
十堰市 (湖北)	19.5	10.6:54.6:34.8	41.0	46.0	12653	3499	89.2
南阳市 (河南)	11.6	20.5:52.0:27.5	38.5	20.5	15077	5666	85

注:数据根据各地市政府网统计公报和相关规划整理。

“软实力”资源的匮乏使得区域发展缺乏战略布局和利益联结机制,区域经济发展难以形成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市场以及自主研发创新体系的产业集聚效应。相反,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着分散式、粗放型经营的低效率,没有形成地方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最终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生产技术水平低、互补性产业不足、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调的恶性循环。

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相对低下,在交通、通讯、社会网络等基础设施欠缺的状态下形成了秦巴山区相对封闭的发展空间,系统的封闭性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并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发展动力,从而形成区域发展的“空间贫困”及内部恶性循环的演进机制。破解这种现状,必须寻求一个有效的支点,从而打破传统,进而获得新的动态平衡,产业精准扶贫正是这类地区突破恶性循环的一种有效策略选择。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机理

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调节作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具有保护促进作用,相反则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生态经济系统的核心问题就是生态与经济的协调与持续问题,‘持续’是系统目标,而‘协调’是系统过

程;生态与经济相互协调,产业发展与生态改良有机结合,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以及操作程序。”^[12]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其内在互动机理为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为主要特征。其中,产业精准扶贫的“精准”二字正是协调生态与经济互动关系的支点,它是指在“精准识别”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禀赋优势、传统优势产业、区域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基础上,“精准选择”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以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带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实现区域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多重目标的开发式扶贫。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控制资源消耗、再生和污染物的排放。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围绕主体功能区定位,选择、培育具有区域资源禀赋优势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市场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产业链及产业网,达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居民收入增长,技术进步,人文社会环境改善等多重目标,进而减少环境资源压力,最终达到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一)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一致性

从发展的角度讲,积极推进产业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集中贫困地区往往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高度重合,生态环境脆弱导致产业发展滞后是欠发达地区长期贫困的原因所在。但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采取的资源掠夺式开发、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成为世界范围内共同面临的课题。环境污染与贫困治理是各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入,“保护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共识。贫困区产业经济发展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因此,通过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开发具有地域特色资源禀赋的生态产业成为贫困地区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也是获取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渠道。

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首先,生态环境保护为产业精准扶贫提供了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和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退耕还林,恢复和增加植被、涵养和保护水源、治理水土流失、防风治沙,对区域国土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从而推动保护区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林草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体系的形成,并成为区域产业扶贫的主导模式。其次,产业精准扶贫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促进农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驱使农村土地流转和形成规模经济^[13],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与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缓解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压力,控制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保护起到调控作用。

(二)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协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决定着区域内、区域外生产要素的配置与再配置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关系到区域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在与外界的能量交换中不断改变自身状态,实现产业结构内部重心和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的过程”^[14]。作为区域“资源配置器”和“调控体”,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决定着区域资源是否高效利用、产业之间是否协调,地区优势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和转型压力,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破解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路径选择。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实质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促使区域生产要素流动与聚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生态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区域品牌的塑造能力、区域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多重目标。秦巴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产业精准扶贫就是在充分考虑区域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等因素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就是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选择适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布局要求的特色产业,以新兴产业改变传统产业,促进区域产业聚集、产业协调和产业关联效应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科技支撑、信息化城镇,带动产业基地和园区化建设促进特色产业关联、产业集群和产业融合,实现传统农业向多功能现代农业转型,以区域特色生态农业和特色生态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推进区域主导产业链的延伸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结构生态化就是选择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相协调的产业,将产业发展由效益低、消耗高的领域转移到效益高、消耗小的轨道上来。

(三)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直以来,关于贫困及反贫困的研究都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黑格尔、卢梭等的“人权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缪尔达尔的“回波效应理论”与“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以及“多维贫困理论”、“空间贫困理论”、“知识贫困理论”等等。贫困理论研究沿着“收入贫困”向“能力贫困”及“人文贫困”的演进^[15],反贫困方式也由“强调物质资本的救助式扶贫,到强调人力资本开发的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强调社会资本投资的参与式扶贫”^[16]的转向。然而,无论是社会救助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等,产业扶贫既是各类扶贫措施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各类扶贫措施的有效支撑。“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头戏,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需要通

过发展生产实现脱贫,而且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脱贫、发展教育脱贫也都离不开产业扶贫的支撑。”^[17]客观地说,“将‘贫困’与‘发展’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在寻找合适生态位,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18],也是人类在寻求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产业精准扶贫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根基,是可持续脱贫的依托,是解决生态功能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关键。首先,根据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产业精准扶贫促使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增加产业扶贫项目和资金,培育具有区域资源禀赋优势的农业产业集群和生态旅游,以产业聚集、产业联动整合区域资源,提升区域竞争力,培育区域市场、区域文化、区域品牌、区域创新能力等软实力,进而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并稳定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地方人文素养等,才能有效地化解“贫困—脱贫—返贫”的怪圈。其次,通过产业扶贫,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产业,才能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和稳定收入来源,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所造成的掠夺式开发,对区域自然环境起到保护作用。再次,通过产业精准扶贫以现代农业改变传统农业,以新型产业驱动产业融合、产业联动、产业聚集促进区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实现区域资源循环利用,达到区域资源、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从而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驱动因素

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耦合性的复合系统。以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决定产业精准扶贫模式,而产业精准扶贫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优化又为产业发展演化提供必要的资源禀赋、自然环境承载力、产业基础、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等综合要素。归纳起来,秦巴山区生态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驱动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地域文化等;而外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推动力和市场需求的拉动力等。

(一) 内部因素

1. 资源禀赋

区域资源禀赋是指“与地域相关联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总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总是顺应自然环境与利用当地资源来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形成与地域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相匹配的产业与产品结构”^[19]。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是区域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源初驱动力,也是区域产业持续发展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使得丰富的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生态资源优势得到凸显,这些为发展特色农业、水产养殖和生态旅游等产业提供了资源禀赋优势。产业精准扶贫就是要深挖“绿色、生态”这一主题,选择、培育、扶贫绿色生态产业,形成特色农业园区、农林产品加工基地,现代化工业、生物制药和新材

料产业基地,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特色旅游业产业基地等,带动区域生态产业专业化、规模化、聚集化发展,使区域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2. 基础设施

资源禀赋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先天条件,而基础设施则是区域产业发展的“助推器”。相关研究指出“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为规模效应、空间配置效应、结构效应与福利效应”^[20]。这些效应有助于区域生产要素的流动及优化配置,专业化市场的形成。交通运输、能源动力、邮电通信、金融中介、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产业发展,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社会资本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精准扶贫的过程,也是加强对贫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通过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贫困地区生产要素得到有效的流动和市场配置,特别是农村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流动及重新配置,缓解了对农村有限耕地、森林等生态资源的掠夺式利用,为秦巴山区植被恢复、自然生态平衡起到间接的调节作用。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加速了区域产业化进程,由内向经济转向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市场效应,成为区域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引擎。

3. 产业基础

区域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地理锁定”特征,传统优势产业往往是形成区域专业化市场、产业聚集的良好开端。秦巴山区工业经济不发达,特色农业是其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符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发展的产业。依托特色优势生物资源、现代生物技术和生态环境资源,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多功能农业,以现代农业带动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化工和新材料产业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4.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作为社会资本影响着区域产业发展的深度。培育地域文化、塑造区域形象,成为区域组织联系及运行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在产品消费中对文化品位的需求日渐剧增。秦巴山区作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汇处,南北气候的交汇处,以及湖广移民的交汇处,两汉三国、汉水文化、茶马古道、移民会馆、特色饮食、地方曲艺等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对这些文化及其元素的挖掘为区域产业、产品升级提供了人文底蕴和丰富内涵,推动区域产业根植性、独特性、创新性发展。

(二) 外部因素

1. 政府的推动力

环境保护和产业精准扶贫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行为,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包括制度、政策、基础设施等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推动着产业扶贫的进程。政府扶贫政策设计决定着扶贫产业主体的孕育,产业发展互动关系及产业运行收益风险机制的培育;政府制度设计为扶贫产业发展吸引

资金、人才、技术等支撑,决定着扶贫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演进,实现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及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着扶贫产业的转型升级,扶持富有地域文化的研究平台、技术研发平台、质量检验检测平台及行业协会、信息服务、交易等中介机构为产业互动、产业关联、产业集聚及区域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形成等提供土壤和润滑作用。同时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政府政策还起到平衡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调控、协调、监督作用。

2.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市场需求是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演化的重要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发展趋势表现出“消费不断向新领域拓展、中下层居民的消费得到优先和更快增长、消费中的不健康不合理成分被剔除或减少、消费的个性化多样化选择性强化、网购等新型交易方式快速推广”^[21]等新特征。人们在传统温饱型社会需求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满足后对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日渐凸显,对生态环境、绿色、有机食品等食品质量安全及个性化、多样化的休闲体验等新需求成为趋势,这为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多功能农业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发展契机。

秦巴山区产业精准扶贫正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以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消费观等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做好供给侧改革,规划设计产业扶贫项目,依托区域特色农业、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一村一品”、“一村一景”发展有机食品、生态产品、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健康养生养老业、生态旅游等,以绿色发展、生态消费形成区域生态产业体系,满足市场需求变化的新要求,实现区域现代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一、二、三产业关联,达到贫困区产业链整合及价值链延伸,进而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

四、秦巴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的实践与成效

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十堰、南阳八市是秦巴山区典型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主体功能区。由于这些地区80%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的中高山区,受到自然、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等限制,传统以单一粮食生产、毁林开荒、广种薄收为特征的掠夺式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空间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和主体功能区等宏观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这些地区从退耕还林、西部“山川秀美”、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等工程中逐步树立了“保护优先、绿色发展、成果共享、优化格局和完善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契机,利用退耕还林、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生态补偿、集中连片扶贫攻坚项目和资金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相适应的

特色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进而通过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控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目前已逐步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绿色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生态与经济社会同步”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 保护优先,生态效应成效显著

修复生态、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提供生态产品、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等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秦巴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而保护工程的推进也为该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环境条件的转化提供了契机,生态资源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优势资源和财富。从2000年开始陆续实施的退耕还林、西部山川秀美、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等生态修复工程以来,秦巴山区贫困区主要地市生态效应成效显著,到2015年,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十堰、南阳八市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58.18%、65%、66.5%、42.5%、55.3%、57.33%、63%、35.8,空气质量达到和好于二级以上天数年均接近三百六十多天,水质达标率100%;该地素有“生物资源宝库”、“天然物种基因库”之称,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生态资源优势日益凸显,目前拥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58个、森林公园54个、地质公园十多个、风景名胜区近三十多个、湿地公园近十余个等;拥有黑木耳、香菇、生漆、核桃、板栗、油桐、天麻、栓皮、黄连木、杜仲、厚朴、茶叶、山茱萸、花椒、油橄榄、党参、当归、红芪、大黄、甘草等经济林特、林化产品等特色物种资源;许多地市成功创建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中国低碳生态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形成了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这些生态资源、生态景观、生态环境等生态资产存量在类型、规模、数量、质量、空间分布等层面的提升,为特色种植、养殖等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优质资源禀赋和经营环境,成为生态产业开发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因素,为贫困区产业精准扶贫提供了优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二) 绿色发展,步入生态经济社会良性循环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与自然环境承载、区域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达到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巩固生态保护工程成功及可持续性的关键。为此,在生态资源优势日益突出的有利机遇下,秦巴山区各地市通过生态补偿、扶贫项目等带动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快速发展(如表2所示)。

秦巴山区生态资源促使特色优势向生态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园区化发展,在转变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的同时,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和区域品牌的形成,形成特色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融合,进一步延长了绿色产业链,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固定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缓解了土地、森林等生态环境与资源的过度使用,生态保护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

表2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特色生态农业与旅游业发展状况(2015年)

区域	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	
	特色优质农林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个)	龙头企业(家)	总收入(亿元)	3A级以上景区(个)	总收入(亿元)
汉中市(陕西)	绿色蔬菜、柑橘、稻米、茶叶、食用菌、中药材、乌鸡、生猪等	13	195	116	14	152.8
安康市(陕西)	绿色蔬菜、富硒茶、蚕桑、绞股蓝、魔芋、木瓜、核桃、狮头柑等	7	127	233.46	12	144.9
商洛市(陕西)	板栗、核桃、葡萄、柿子、茶、黑木耳、丹参、九眼莲、香菇、中草药等	12	81	168	21	174.87
陇南市(甘肃省)	花椒、核桃、油橄榄、茶叶、蔬菜、中药材等	14	169	151	13	48.8
广元市(四川省)	本油料、红心猕猴桃、茶叶、烟叶、蔬菜等	24	307	113.5	19	207.16
巴中市(四川省)	核桃、茶叶、药、银耳、香菇、板栗、银杏、生漆、杜仲、黄柏、厚朴等	20	163	74	11	130.62
十堰市(湖北省)	木耳、晒烟、贡米、肚倍、翘嘴鲇、香菇、柴胡、黄连、白羽乌鸡、茶等	39	54	286	44	299.83
南阳市(河南省)	裕丹参、桐柏桔梗、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猕猴桃等	5	292	638	35	214.80

(三) 成果共享 减贫效应初步得到实现

基于生态保护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特色优势产业生态化发展 驱动秦巴山区经济社会整体快速发展。根据表3 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与2010年(表1)相比较,到2015年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地区主要地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及所在省水平,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城镇化率得到快速提高,产业经济从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向要素和科技创新等驱动转变。到2015年底,汉中、安康、商洛、陇南、广元、巴中、十堰、南阳八市分别实现了54.9万、36.7万、46.9万、64.37万、40.2万、55.3万、50万和64万人彻底告别落后贫困的现状,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

以“产业选择精准、经营方式精准、支持方式精准、贫困人口受益精准”^[21]的精准化产业扶贫解决了贫困人口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达到脱贫不返贫的减贫成效,是生态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脱贫村产业发展示范效应带动毗邻乡村根据其自身特有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传统产业积极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镇一景”等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实现扶贫区特色产业差异化开发和专业化市场的形成。扶贫产业发展定位的准确,使得农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高端

化发展,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将分散

表3 秦巴山区连片特困主要地市2015年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指标

区域	GDP增长率(%)	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占总产值比重)	城市化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国	6.9	9.0:40.5:50.5	56.10	9.8	31195	10291
汉中市(陕西)	9.6	18.0:44.0:38.0	40.08	23.0	23625	8164
安康市(陕西)	12.3	12.4:55.3:32.3	44.32	25.2	27191	8196
商洛市(陕西)	11.2	14.8:52:33.2	54.67	22.8	23509	7706
陇南市(甘肃省)	9.5	22.31:23.14:54.55	28.16	10.84	18915	5405
广元市(四川省)	8.6	16.5:47.2:36.3	40.83	3.8	23628	8939
巴中市(四川省)	8.6	16.8:46.6:36.6	37.52	21.5	23845	9084
十堰市(湖北省)	7.5	12.1:48.9:39.0	51.6	18.7	24057	7779
南阳市(河南省)	9.2	16.0:45.8:38.2	42.07	17.0	25140	10777

的农户家庭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现代农业生态园的规模化经营;通过组织创新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向农村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基地”等具有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及产品包装、保鲜、储藏、运输,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品牌化经营强化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意识,以无公害、绿色、有机、生态及地理标志产品等商标注册及品牌认证、管理促进特色农产品进入市场,获得市场效益。同时生态保护促使乡村旅游业快速发展,达到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优化配置,农民固定就业和稳定收入增长等成效。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互动发展最终达到生态美、城乡美、产业强和百姓富裕高度契合。

参考文献:

[1]刘小鹏,苏晓芳,王亚娟,等.空间贫困研究及其我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启示[J].干旱区地理,2014,37(1):144-152.
 [2]周亮,徐建刚,林蔚,等.秦巴山连片特困区地形起伏与人口及经济关系[J].山地学报,2015,33(6):742-750.
 [3]梁增泰.秦巴山区人口增长与人文景观的变迁[J].经济地理,1984,(4):289-295.
 [4]赖作莲,查小春.陕南秦巴山区人口承载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7):6-9.
 [5]鲁西奇.山区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关系——“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读后[J].江汉论坛,2008,(10):141-143.
 [6]孟文科.清代秦巴山区汉人移民的生计模式及其转型[J].农业考古,2013(1):29-33.

- [7]王璐,黄晓燕,曹小曙,等. 贫困山区不同层级可达性及其经济效应——以秦巴山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1): 156-164.
- [8]赵世发,王俊,杜继稳,等. 秦巴山区地质灾害成因及预报预警[J]. 气象科技, 2010, 38(2): 263-269.
- [9]贺雪峰. 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6): 1-6.
- [10]康文峰,杨继瑞.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要素失衡缺失陷阱”的破解路径[J]. 区域经济评论, 2013(6): 89-95.
- [11]吴光芸,唐兵. 论区域软实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现代经济探讨, 2009(6): 36-40.
- [12]王关区. 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的思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4, 25(3): 125-129.
- [13]张四梅. 经济结构变化对农用地流转的影响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3): 124-130.
- [14]陈访贤,徐充.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理论思考[J]. 新疆社会科学, 2015(6): 7-11.
- [15]杨宜勇,吴香雪. 农村反贫困: 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护的协同推进[J]. 西北人口, 2016, 37(3): 1-6.
- [16]刘敏.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J]. 甘肃社会科学, 2009(5): 213-215.
- [17]刘北桦,詹玲. 农业产业扶贫应解决好的几个问题[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3): 1-4.
- [18]杨未. 生态位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解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8): 155-160.
- [19]傅允生. 资源禀赋与专业化产业区生产[J]. 经济学家, 2005, (1): 84-90.
- [20]张从丽. 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探析[J]. 经济与管理, 2008, 22(6): 10-13.
- [21]易培强.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对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5): 131-137.
- [22]余欣荣. 特色产业扶贫重在“精准”[J]. 行政管理改革, 2016(4): 25-28.
-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南生态资源保护与产业化扶贫互动途径及机制研究”(2016D011);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项目“基于生态视角的陕南产业发展研究——陕南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耦合产业链形成机理与政策研究”(2014KRM21-01)。
- 作者简介: 陈绪敖(1977—),男,陕西旬阳人,安康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国军; 校对: 亚中